

中国古文献学研究 ①

古代辨伪学概述（上）

孙 钦 善

辨伪学是古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它的内容是研究考辨古书真伪的方法和问题。辨伪是一项鉴别史料的基础工作，对于整理古籍来说，也是一个首要的环节。

古书的真伪问题，普遍存在。明胡应麟《四部正讹》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之一种）说：“余读秦汉诸古书，覈其伪几十七焉。”清张之洞在《輶轩语》中说：“一分真伪，而古书去其半。”这当然只是一种估计，是否确凿，虽不无可商榷之处，但用来说明古书作伪的严重性和辨伪的重要性，亦无不可。

伪书产生的原因和情况比较复杂，前人已有所总结、归纳，最早当推胡应麟，他在《四部正讹》中说：

凡贗书之作，情状至繁，约而言之，殆十数种；

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，风后之《握奇》，岐伯之《素问》，是也；

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感之者，卜商之《易传》，毛渐之《连山》（传说三《易》之一），是也；

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，仲尼倾盖而有《子华》（按：《孔子家语》有孔子遇程子倾车盖而语事，《庄子》有子华子见韩昭僖侯，后人遂作《子华子》，谓程本撰。），柱史（柱下史老子）出关而有《尹喜》（按：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有老子至关，遇关令尹

喜事。后遂假托造《关尹子》一书），是也。

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，伍员著书而有《越绝》（按：指东汉人依伍子胥书增饰而为《越绝书》），贾谊赋鹏而有《鹖冠》（按：指后人取贾谊《鹏鸟赋》，杂以黄老刑名之言，而造《鹖冠子》。实本有《鹖冠子》，后人增进《鹏鸟赋》），是也。

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，尹负鼎而《汤液》闻（按：《孟子·万章上》、《吕氏春秋·本位》等有伊尹负鼎俎而说商汤之事，后人假托伊尹作《汤液》一书）、戚饭牛而《相经》著（按：《楚辞·离骚》、《吕氏春秋·直练》记有宁戚喂牛而歌，齐恒公闻而举贤事，后人遂假托宁戚而作《相经》），是也。

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，汲冢发而《师春》补（按：西晋汲郡人盗战国古墓，发现一批竹筒古书，其中有《师春》，记《左传》中卜筮事，后此书亡，又有人蹈名伪托），《樛机》记而楚史传（按：《孟子·离娄下》说“楚之《樛机》”，后人遂袭其名而伪作楚史），是也。

有憚于自名而伪者，魏泰《笔录》之类是也（按：魏泰有《东轩笔录》，未假他人之名。此当指魏泰假名张师正作《志怪集》、《括异记》、《倦游录》以诬前人）。

有耻于自名而伪者，和氏《香奁》之类是也（按：和凝少时作《香奁集》，后显贵，假名韩偓）。

有袭取于人而伪者，法盛《晋书》之类是也（按：何法盛《晋书》窃郗绍《晋中兴书》而成）。

有假重于人而伪者，子瞻《杜解》之类是也（按：《杜解》题苏轼作，乃借重其名）。

有恶其人，伪以祸之者，僧孺《行纪》之类是也（按：李德裕门人伪撰《周秦行纪》，以害异党牛僧孺）。

有恶其人，伪以诬之者，圣俞（梅尧臣）《碧云》之类是也（按：魏泰假梅尧臣之名作《碧云叢》，议及范仲淹）。

有本非伪，人托之而伪者，《阴符》不言三皇而李筌称皇帝之类是也。

有书本伪，人补之而益伪者，《乾凿度》及诸伪书类是也。

又有伪而非伪者，《洞灵真经》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《亢仓》，

《西京杂记》本葛雅川（洪）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。

又有非伪而曰伪者，《文子》载于刘歆《七略》，历梁、隋皆有其目，而黄东发（震）以为徐灵府，《抱朴》纪于勾漏本传，历唐宋皆志其书，而黄东发以非葛雅川之类是也（按：黄震说见《黄氏日钞》）。

又有非伪而实伪者，《化书》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，《庄注》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（象）取而点定之类是也。

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，刘炫《鲁史》之类是也。

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，司马《潜虚》之类是也（按：司马光的《潜虚》，《朱子语录》、黄震《日钞》均谓司马光属草未成，后人贗补行世）。

又有本无撰人，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，《山海》称大禹之类是也。

又有本有撰人，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，《正训》称陆机之类是也。

以上名目虽繁，但分析起来不过两大类：一是有意假托作伪，一是因失考误断致伪。至于辨伪方法，最早作系统总结的也是胡应麟。《四部正场》说：

凡覈伪书之道：覈之《七略》以观其源，覈之群《志》以观其绪，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，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，覈之文以观其体，覈之事以观其时，覈之撰者以观其托，覈之传者以观其人。覈兹八者，而古今贗籍亡（无）隐情矣。

所谓“覈之《七略》以观其源”，是说从我国第一部目录《七略》考察最早的著录。《七略》为刘歆在其父刘向《别录》的基础上编著的一部分类目录书，原书已佚，其体制、规模由删其要而成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可见。所以后人即将《汉志·艺文志》与《七略》视为一体。

所谓“覈之群《志》以观其绪”，是说从历代史书《艺文志》或《经籍志》，以及官修目录、私修目录的著录上考察其流传情况。以上两条均属从目录著录上考察源流以辨真伪。

所谓“覈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”，是说从同世当代的著作中考察某书称引他书，或某书被他书称引的情况。这是从横的关系上考察。

所谓“覈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”，是说从前后不同世的著作中考察某书转述他书，或某书被他书转述的情况。这是从书与书之间纵的关系上考察。

所谓“覈之文以观其体”，是说从文章体裁特征上考察。

所谓“覈之事以观其时”，是说从所涉史实以考其年代。

所谓“覈之撰者以观其托”，是说考证某书的真正作者，以明假托。

所谓“覈之传者以观其人”，是说考察某书的传人，以求作伪之人。因为某书已佚，又突然传世，则传书之人往往即作伪之人。

这是对前人和他自己辨伪经验的总结，概括得亦颇精要，在辨伪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近人谈辨伪方法者又有数家，虽各有补充和发展，但其说皆脱胎于此。如胡适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将审定真伪的证据归纳为史事、文字、文体、思想、旁证五种，除文字、思想两种外，余皆为胡应麟所有。又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提出辨伪书的十二条公例，除第十一条“各时代之社会形态”及第十二条“各时代之思想”两条外，余亦皆为胡应麟所有。其后，梁启超在《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》（本为1927年在燕京大学教课的讲义，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）中，对辨伪方法条分缕析，有更为详尽的概括，堪称辨伪方法的集成之作，但亦以胡应麟辨伪八法为基础，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。文繁不录，可参看原书。

辨伪方法日趋精密，是辨伪学不断发展的结果。在我国古文献学史中，辨伪学的历史源远流长。细究起来，辨伪学的历史是分两条线交错发展的：一条是关于书籍的名称、作者、年代真伪的考辨，一条是关于书籍内容诸如事实、论说真伪的考

辨。前者属狭义辨伪学，后者可以包括到广义辨伪学内。下面以前者为主，兼顾后者，作一历史回顾，以求对辨伪学有具体的了解。

一、先秦

《四部正伪》引言说：“贗书之昉（始也），昉于西京乎？六籍既焚，众言淆乱，悬疣附赘，假托实繁。”这里把伪书之兴，溯自西汉。其实作伪与辨伪在先秦就已有了。龚自珍在《家塾策问二》中说：“伪书不独后世有之也，战国时人，依托三皇五帝矣，或依托周初矣。”这是事实，但从战国仍可上溯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载：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为“良史”，“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”，杜预注：“皆古书名”。这些古书在当时恐即伪托之作。应该说作伪与辨伪是与文献的成书与流传大致相始终的。先秦是我国传世古籍中经籍文献和诸子文献的成书时期，当时这两类文献皆有作伪与辨伪的问题。

孔子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整理古文献的祖师，先秦的几种主要经籍文献，大都经他的手整理过。他的一些学术思想，也在辨伪学史上产生巨大影响。他“信而好古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似乎比较保守。但他并不盲目迷信，又说：“夏礼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。足，则吾能征之矣。”（《八佾》）这种无征不信的态度是科学的，影响是积极的。其他如“多闻阙疑”（《为政》），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”（《述而》）；反对主观臆断：“子绝四：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”（《子罕》）；不信怪诞虚妄：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（《述而》）等思想也是如此。孔子不信怪诞虚妄的思想，贯穿于古文献整理的实践当中。如《公羊传·庄公七年》：“夏四月，辛卯，夜，恒星不见。夜中，星陨如雨。……不修《春秋》曰：‘雨星不

及尺而复。’君子修之曰：‘星陨如雨。’”“不修《春秋》”即指未经孔子整理的《春秋》，其记陨星的情况，说陨星下落如雨，离地一尺而又返回，颇涉怪诞，故孔子改之（按：王充《论衡·艺增篇》及《说日篇》皆提及此事，云：“君子者，孔子也。”）。这说明孔子的学风较为平实。但是孔子的这一思想也有片面性、局限性的一面，这就是不能正确处理有关传说时代的文献史料，往往会简单地目为虚妄而加以排斥或歪曲、篡改，以致造成埋没或曲解史料的后果。如根据无阶级社会的传说来构筑自己的理想王国，把传说中的部落首领歪曲成阶级社会的“圣帝”、“圣王”，就是例子。又孔子往往歪曲史料，使之为其政治思想服务。如说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一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（《为政》）就是明显的一例。于是“思无邪”成了封建学者曲解《诗经》（尤其是国风部分）的总根源，影响极为深远。

孟子也是辨伪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。他的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的说法，被赋与一般意义，成为后世疑古辨伪学者信奉的格言。其实，孟子的这句话，既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，又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。这里所说的“书”，本具体指《尚书》而言。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：“孟子曰：、尽信《书》，则不如无《书》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（竹简）而已矣。仁人无敌于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”佚篇《尚书·武成》是写武王伐纣的（按：今《尚书·武成》为伪古文，叙“血流漂杵”为商纣士兵倒戈自相残杀的情况，是根据孟子思想篡改了的意思，与《孟子》所叙原意本合）。当时诉诸武力，发生流血，皆为事实，只是“血之流杵”的写法有些夸张而已。而孟子从儒家的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思想出发，认为对周武王的这种记载，违背他心目中的“圣王”偶像，所以极力加以否认，怀疑《武成》的记载不可信。这说明他的辨伪标准是儒家的思想原则，而不是客观事实。影响所及，后遂有

“武王伐纣，兵不血刃”歪曲说法（见《荀子·议兵》、《说苑·指武》、《太平御览》329引桓谭《新论》）以及伪古文《尚书·武成》的篡改之文。

可见儒家既有辨伪的一面，又有依傍前代文献作伪立说的一面。

《墨子》书中也屡提诗书礼乐，引《夏书》、《殷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秦誓》、《禹誓》、《汤说》、《周礼》之处多见。墨子跟孔子一样，也依托先王，但目的不同，墨子旨在宣扬自己的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诸说。

对于儒墨的托古作伪，韩非有所辨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说：“孔子、墨子俱道尧舜，而取舍不同。皆自谓真尧舜，尧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？……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，诬也。故明据先王，必定尧舜者，非愚则诬也。”这里提出了参验事实的辨伪方法，很值得重视。

总地看来，先秦的辨伪学还处在草创阶段，以辨伪说为主，且多与学派之间的争论相关连。

二、两汉

由于秦始皇焚书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动，古书屡经散亡，加上新的统治者为巩固统治的需要，歪曲、改造前代文献，制造理论根据，致使伪书、伪说乘势而生。但事物相反相成，也促使了辨伪学的发展。

汉代第一个辨伪学家当推司马迁（公元前145—86）。他在编写《史记》时，对有关史料作了大量的考辨工作。其中既涉伪书，又涉伪说。如《五帝本纪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五帝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《宰予问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空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。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，

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予观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，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章矣。顾弟不深考，所表见皆不虚。书缺有间矣，其軼乃时时见于他说，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”这里把民间传说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，认为古文经传的说法较可靠。又如《周本纪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学者皆称周伐纣，居洛邑。综其实不然，武王营之，成王使召公卜居，居九鼎焉。而周复都丰镐，至犬戎败幽王，周乃东徙于洛邑。”这里据事实驳伪说。《老庄申韩列传》谓庄子：“故其著书十余万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作《渔父》、《盗跖》、《胠箧》，以诋訾孔子之徒，以明老子之术；《畏累虚》、《亢桑子》之属，皆空语，无实事。”这里指明了庄子寓言的诡曲和虚构，并开对诸子书单篇考辨之例。《仲尼弟子列传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，誉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，钩之未睹厥容貌。则论言弟子籍，出孔氏古文近是。余以弟子名姓文字，悉取《论语》弟子问，并次为篇，疑者阙焉。”这里以求真为目的，考辨了关于孔子弟子的史料，得出了古文《论语》近是的结论。其他例子还很多，从略。司马迁对史料的考辨和采用，有得亦有失，其失在于并未跳出前人（主要是儒家学派）用帝王体系附会远古无阶级社会的窠臼，这是历史和思想局限所致，不宜苛求。关于司马迁考辨史料的得失，拙文《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》（载《文献》八〇年第二辑）有所论及，可以参见。

汉代经今古文之争，也贯穿着辨伪问题。武帝时，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，以扩建宫室，在墙壁中发现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集书，皆古字，此为古文经传。

（按：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论衡·佚文篇》及《案书篇》皆作“武帝未”，非是，鲁共王卒于武帝元朔二年，时值武帝初期，不得有武帝未毁孔子宅发现古书事。《论衡·正说篇》作

“景帝末”。故知发现古书当在景帝末、武帝初，刘馥任鲁共王之时。此姑笼统称“武帝时”。)民间也有发现，合孔壁书计有《周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经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(《周礼》)、《春秋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十种。古文经传的发现，对辨伪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也引起真伪的争论。同时也有人乘机造伪书以求名利。

古文经传在辨伪上的作用，不仅表现在辨正今文家伪造的某些经说方面，也表现在辨伪书取证方面。前者例子很多，兹不详举。后者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：“世所传百两篇(《尚书》)者，出东莱张霸，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，又采《左氏传》、《书叙》为作首尾，凡百二篇，篇或数简，文意浅陋。成帝时，求其古文者，霸以能为百两徵，以中书校之，非是。”张霸根据百篇书序之数，并加首尾，伪造一百零二篇《古文尚书》以献，很快即被识破，所恃有“中书”(秘府藏书)为证。这里的“中书”，显然指秘府所藏比《今文尚书》多十余篇的从孔壁发现的《古文尚书》。

但是，在西汉，今文经传立于学官，古文经传向不得势，被诬为伪书。成帝时，刘歆争立古文，驳今文家门户之见，其《移太常博士书》说：“往者缀学之士，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固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。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至于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原。犹欲抱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。或怀妒嫉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意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不备，谓《左氏》为不传《春秋》，岂不哀哉？……且此数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视，其古文旧书，皆有徵验，内外相应，岂苟而已哉！”东汉初班固也反对今文家穿凿附会及其对古文经传的驳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后世经传既已乖离，博学者

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，而务碎义逃难，便辞巧说，破坏形体，说五字之义，至于二三万言。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。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蔽。”东汉时今古文并行，仍互有论辨。至郑玄遍注群经，杂糅今古，既受到今文家的反对，又受到古文家的反对。今古文之说，各有是非，我们应具体分析，实事求是，不可囿于各派门户之见。一般说，古文经传比较质实、可靠，但亦有伪作，如《周礼》一书，并不是周公所作，而是成书于战国，包括了周至战国的制度。唐贾公彦《周礼疏》载有各家说法：“《周礼》起于成帝刘歆，而成于郑玄，附杂之者大半。故林孝存（按：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作“临孝存”，名硕，郑玄弟子）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（即《周礼》）末世黷乱不验之书，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。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。唯有郑玄遍览群经，知《周礼》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，故能答林硕之论难，使《周礼》义得条通。”以临孝存及何休所主今文家说为是，而郑玄所主古文家说为非。古文经传虽亦有伪作，但绝非如今文家所说全是伪作。今文家全盘否定西汉发现的古文经传，实出自于政治上的利禄之念、学术上的门户之见，并非实事求是。

汉代的辨伪学，在目录学中有反映。刘向（公元前77—6）整理群书，撰写《别录》，包括辨伪的内容。如《晏子叙录》说：“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。”《列子叙录》说：“至于《力命》篇一推分命，《杨子》之篇唯贵放逸，二义乖背，不似一家之书。”皆以思想为据，有一定见识。又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神农》二十篇”下师古注引《别录》曰：“疑李悝及商鞅所说。”这里是说《神农》一书为李悝及商鞅依托之作。刘歆（？—公元23）在《别录》基础上编撰《七略》。班固（公元32—92）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又系节略《七略》而成。《七略》不传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书名下自注，多有辨伪语，其中或亦包括

《七略》原有的意见，具体分别，已无从考。《艺文志》的例子如：《文子》九篇，注：“老子弟子，与孔子并时，而称周平王问，似依托也。”《力牧》二十二篇，注：“六国时作，托之力牧。力牧，皇帝相。”《大禹》三十七篇，注：“传言禹所作，其文似后世语。”《神农》二十篇，注：“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，道耕农事，托之神农。”（按：据前引此下师古注引《别录》语，此注当为班固自意，因《别录》特指李悝、商君，此泛指六国时诸子，二者不同。）《伊尹说》二十七篇，注：“其语浅薄，似依托也”。《鬻子》十九篇，注：“后世所加。”《师旷》六篇，注：“见《春秋》，其言浅薄，本与此同，似依托也。”《务成子》十一篇，注：“称尧问，非古语。”《天乙》三篇，注：“天乙谓汤，其言非殷时，皆依托也。”《黄帝说》四十篇，注：“迂诞，依托。”《封胡》五篇，注：“黄帝臣，依托也。”《风后》十三篇，注：“黄帝臣，依托也。”《力牧》十五篇（按：属阴阳家，与前属道家之《力牧》二十二篇者异），注：“黄帝臣，依托也。”这些是纯粹辨伪书的例子，甚为可贵。看起来辨语简单，根据亦较单薄，但在取证方面已包括作者时代、思想内容、语言等，《师旷》之辨还涉及文字出处。这在辨伪学初期阶段，已不容易。

东汉还有一个著名的辨伪学家王充（公元27—约96）。他写《论衡》，辨伪是重要目的之一，《对作篇》（按：此篇相当于《论衡》的自序）说：“《论衡》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，辩其虚实。”《论衡》所辨，以伪事、伪说为主，正如《佚文篇》所说：“《论衡》以十（当作“百”）数，亦一言也，曰疾虚妄。”但亦涉及伪书。《论衡》中《奇怪》、《书虚》、《道虚》、《语增》、《儒增》、《艺增》、《问孔》、《刺孟》、《谈天》、《说日》、《实知》、《知实》、《定贤》、《正说》、《书解》、《案书》等，都是辨伪的突出篇章。首先，

王充有离经叛道的思想，敢于破除对儒家圣人的迷信。例如《知实篇》列举十六事证明“圣人不能神而先知”，其中孔子占十四例，孟子占一例，周武王占一例。又如《问孔》篇说：“案圣贤之言，上下多相违，其文前后多相伐；世之学者，不能知也。”他还怀疑经传，如《书解篇》说：“书（按：指诸子书）无佚本，经有遗篇”，“书亦为本，经亦为末。末失事实，本得道真。……知经误者在诸子”。《正说篇》说：“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。前儒不见本末，空生虚说；后儒信前师之言，随旧述故，滑习辞语。……故虚说传而不绝，实事没而不见”，“经之传不可从，五经皆多失实之说”。其次，力辨今文经说及纬书中的“天人感应”迷信之说，详见《谴告篇》、《自然篇》等。再次，在辨伪方法上，或据实情以辨虚妄之说，如前举孟子驳佚书《武成》武王伐纣“血之流杵”之说以后，儒家便跟着附会出“武王伐纣，兵不血刃”之说，对此王充在《语增篇》中据事理加以反驳：“或言：武王伐纣，兵不血刃，……案高祖伐秦，还破项羽，战场流血，暴尸数万，失军亡众，几死一再，然后得天下。用兵苦，诛乱剧，独云周兵不血刃，非其实也。言其易，可也；言不血刃，增之也。”王充不否认暴力、流血，但又认为：“《武成》言‘血流浮杵’，亦太过焉。”（《艺增篇》）这样又排除了夸张成分，就比较近于史实了。或据可靠之说以辨虚妄之说，如《正说篇》，据《孟子》关于《春秋》为鲁史记之名的说法，认为：“孔子因旧故之名，以号《春秋》之经，未必有奇说异意，深美之据也。今俗儒说之：‘春者，岁之始也；秋者，其终也。《春秋》之经，所以奉始养终，故号为《春秋》。’说《春秋》者，失圣之意矣。”又据《左传·桓公十年》“不书日（不记载日期），官（史官）失之也”之说，驳今文家附会之词，认为：“若夫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之传，日月不具，辄为意使（按：谓有意使然，寓有深旨）。平常之事，有怪异之说；径直之

文，有曲折之义，非孔子之心。”或举作伪之旨，以辨伪说、伪书，《书虚篇》说：“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，多欲立奇造异，作惊目之论，以驳世俗之人，为譎诡之书，以著殊异之名。”

王充的疑古辨伪精神，在辨伪学史上影响很大。如唐代刘知几，在辨伪学久经衰落之后，重新举起辨伪旗帜之时，就是以王充相标榜的。

东汉古文家马融（公元4—79），曾辨当世所传伪《泰誓》，论证颇为细密，值得一提。《尚书·泰誓序》疏：“马融《书序》曰：‘《泰誓》后得，案其文似若浅露。’又云：‘八百诸侯不召自来，不期同时，不谋同辞，及火复于上，至于王屋，流为鵬，至五以穀俱来，举火神怪，得无在子不语中乎？’又《春秋》引《泰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《国语》引《泰誓》曰：‘朕梦协朕卜，袭于休祥，戎商必克。’《孟子》引《泰誓》曰：‘我武惟扬，侵于之疆，取彼凶残，我伐用张，于汤有光。’《孙（荀）卿》引《泰誓》曰：‘独夫受。’《礼记》引《泰誓》曰：‘予克受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无罪；受克予，非朕文考有罪，惟予小子无良。’今文《泰誓》皆无此语。吾见书传多矣，所引《泰誓》而不在《泰誓》者甚多，弗复悉记，略举五事以明之，亦可知也。”这里根据文气和佚文两方面进行辨析，在当时是比较突出的辨伪实例。

魏晋南北朝

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作伪盛于辨伪。

一方面，援道入儒、阳儒阴道的玄学用“忘言忘象”、“寄言出意”的方法解释儒家经典，超脱字面意思而随意附会，产生了新的伪说。正如汤用彤《魏晋玄学论稿》所说：“汉代经学依于文句，故朴实说理，而不免拘泥。魏世以后，学尚玄远，虽颇乖于圣道，而因主得意，思想言论乃较为自

由。汉人所习曰章句，魏晋所习曰通。章句多随文饰说，通者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意。……至若随文作注，亦多择其证成已意处，会通其旨略，未必全合于文句。故向秀‘观书鄙章句’（颜延年《五君咏》），陶渊明‘好读书不求甚解，每有所会，欣然忘食’（《五柳先生传》）。”（本书页31—32）用“寄言出意”的方法调和儒道，不仅歪曲了儒家，也歪曲了道家，如何晏注《论语》，王弼注《周易》，向秀注《庄子》（后为郭象所袭）等，都是如此。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南朝义疏之学，被清人视为经之大蠹。

另一方面，乘社会动乱书籍散佚之机，并适应古文经学兴起的需要，多造伪书。东汉末年，郑玄杂糅今古，形成经学的一统局面。至魏，王肃倡古文，专与郑玄作对。他伪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之孔安国注，以壮古文声势（按：清丁晏著《尚书余论》，谓伪《古文尚书》及伪孔安国传亦王肃伪造）；伪造《孔子家语》，托名孔安国撰，伪造《孔丛子》，托名孔鮒撰，作为驳郑的根据。如作《圣证论》驳郑玄，所取证孔子之言，多出《孔子家语》。对于王肃的作伪，当时郑学之徒有所辨驳，如《礼记·乐记》孔颖达疏引马昭曰：“《家语》，王肃所增加。”《通志》卷91引马昭曰：“《家语》之言，固所未信。”后人不断有疑，至清代孙志祖撰《家语疏证》，才作了彻底辨证，直指系王肃伪造。

当时出现的伪书，影响深远的，莫过于东晋梅赜向朝廷所上的孔安国注《古文尚书》，即流传至今的《尚书》。此书以伪杂真，有本有据，造作手法巧妙，在作伪方面具有典型意义。此书欺世，历经几朝，自宋开始疑辨，至清才有定论，著述甚多，构成一部内容丰富的专书辨伪史。因为后面还要屡次提到这部书，需要在这里把它的来历、情况简单介绍一下。

《古文尚书》本出孔壁，为孔安国所得，藏于朝廷，故称“中古文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四十六卷，班固自注：“为五

十七篇”（按：本五十八篇，师古注引郑玄《叙赞》云：“后又亡一篇，故五十七篇。”）西汉后传授不明。据《后汉书·儒林传·杨伦传》，东汉贾逵、马融、郑玄所注《古文尚书》，传自杜林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“然其所传，唯二十九篇，又杂以今文，非孔旧本。”至魏，王肃注过《古文尚书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“晋世秘府所存，有《古文尚书》经文，今无有传者”，当亡于永嘉之乱。至东晋梅赜时始又出现。关于梅赜所奏《古文尚书》的来历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序录》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孔颖达疏皆言及，如《虞书》题下孔疏云：“又《晋书·皇甫谧传》：‘姑子外弟梁柳得《古文尚书》，故作《帝王世纪》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。’《晋书》又云：‘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榆，榆字休预。预授天水梁柳，字洪季，即谧之外弟也。季授城阳臧曹，字彦始。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，字仲真。又为豫章内史，遂于前晋奏上其书，而施行焉。’”（按：所引《晋书》之文，不见今传本，当为藏荣绪之《晋书》。）又《舜典》开头二十八字下疏云：“昔东晋之初，豫章内史梅赜上《孔氏传》，犹阙《舜典》，自此‘乃命以位’已上二十八字，世所不传，多用王（肃）、范（宁）之注补之，而皆以‘慎徽’已下为《舜典》之初。至齐肖鸾建武四年，吴兴姚方兴于大航头（地名）得孔氏传古文《舜典》，亦类太康中书，乃表上之，未施行，方兴以罪致戮。至隋开皇初，购求遗书，始得之。”

怎样辨别今传《尚书》各篇的真伪？一般都根据孔颖达疏提供的线索，只是孔疏的看法真伪颠倒，与实际情况不符。

《尚书》《虞书》题下孔疏说：“案壁内（指孔子屋壁）所得孔为传者凡五十八篇，为四十六卷。三十三篇与郑注同（按：指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〔自《尧典》分出，加首二十八字〕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谟》〔按：自《皋陶谟》分出〕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〔中、下从《盘

庚》分出〕、《高宗彤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诰》〔自《顾命》分出〕、《吕刑》、《文侯之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三十三篇，如不分割，正二十九篇，与伏生所传今文之数相合。然其中今古文相杂，如《金縢》即属古文，与伏生《尚书大传》所言不同），二十五篇，增多郑注也。其二十五篇者：《大禹谟》一、《五子之歌》二、《胤征》三、《仲虺之诰》四、《汤诰》五、《伊训》六、《太甲》三篇九、《咸有一德》十、《说命》三篇十三、《秦誓》三篇十六、《武成》十七、《旅獒》十八、《微子之命》十九、《蔡仲之命》二十、《周官》二十一、《君陈》二十二、《毕命》二十三、《君牙》二十四、《冏命》二十五。但孔君所传，值巫蛊，不行以终。（按：以上二十五篇，乃纯粹假造的伪孔安国《古文尚书》，孔疏误认为真古文）……孔则于伏生所传二十九篇内，无古文《秦誓》，除序尚二十八篇，分出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、《盘庚》二篇（中、下）、《康王之诰》，为三十三。增二十五篇，为五十八篇。（按：此五十八篇即梅賾所奏真伪相杂的孔安国注《古文尚书》，亦即至今传世的《尚书》，孔疏信为真《古文尚书》）郑玄则于伏生二十九篇（按：实为与伏生二十九篇相对应的《古文尚书》）之内分出《盘庚》二篇、《康王之诰》，又《秦誓》三篇（按：后出，即马融所辨之伪《秦誓》），为三十四篇，更增益伪书二十四篇，为五十八篇（按：此五十八篇，除后出《秦誓》外，当为真《古文尚书》，孔疏却颠倒是非，视为伪古文）。所增益二十四篇者，则《郑注序》：《舜典》一、《汨作》二、《九共》九篇十一、《大禹谟》十二、《益稷》十三、《五子之歌》十四、《胤征》十五、《汤诰》十六、《咸有一德》十七、《典宝》十八、《伊训》十九、

《肆命》二十、《原命》二十一、《武成》二十二（按：此篇刘向时尚在，故《别录》称五十八篇。班固时已逸，故《艺文志》注五十七篇）、《旅獒》二十三、《冏命》二十四。……又古文（按：指伪古文）有《仲虺之诰》、《太甲》、《说命》等见在，而云亡；其《汨作》、《典宝》之等一十三篇见亡，而云已逸，是不见古文（按：指伪古文）也。”按郑玄所增二十四篇，有目无文，乃据《书序》篇名，补足孔安国《古文尚书》五十八篇之数，故或云“亡”，或云“已逸”。伪古文二十五篇造于其后，故篇目互有参差，即使篇名有相同者，内容亦全系伪造。孔疏最后几句话，发现了这一矛盾，但不疑伪古文，反以郑玄“不见古文”加以解释。他所谓的古文，实指伪古文，郑玄在其先，当然无从见到。

根据以上材料，并据自宋至清不少学者考证的结果，知梅賾所上《古文尚书》的作伪情况如下：第一，依《别录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孔安国所得《古文尚书》五十八篇之数拼凑而成；第二，其中三十三篇依今古文《尚书》三十三篇旧文（篇目见前。以今文为主，杂有古文篇章，如《金縢》），并有离析成篇者，如《舜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谟》、《盘庚》中、下、《康王之诰》等；第三，其余二十五篇（即孔疏误为真古文《大禹谟》至《冏命》二十五篇），则因《书序》旧题，依傍往籍，采摘佚文，伪造而成；第四，孔安国传全系托名伪造，与王肃注多同。故有人怀疑伪孔传及伪《古文尚书》出王肃之手（见清丁晏《尚书余论》），或出王肃门徒之手（见崔述《古文尚书辨伪》）。由此今传《尚书》各篇的真伪区分亦自显明。

注：

本栏原名“中国古代文献知识”，主要介绍文献学知识，现为开展中国古代文献理论研究并兼介绍文献学知识，故从本期起改换此栏名。